

论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思想

王思琴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精神产物, 是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的一门交叉学科。迪韦尔热是政治社会学的先驱之一, 他以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 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社会化中的文化适应、社会制度中的权力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主题, 创造性地将政党纳入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域, 并且以独特的角度展开了对政党及其合法性的专门研究, 对后来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迪韦尔热; 政治社会学; 政治社会化; 权力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18) 04 - 0055 - 06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18. 04. 009

On Duverger's Political Sociology Theory

WANG Siqi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230601)

Abstract: Political sociology is the spiritual product of mutual penetration and fusion of politics and sociology. It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to study political phenomena with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 Duverger i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political sociology, He established that the object of political sociology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On this basis, he regarded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the power of social system as the theme of political sociology, incorporating political parties with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ociology creatively and carrying out special research on the party and its legitimacy with a unique perspective,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ociology.

Key words: Duverger; political sociology;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ower

莫里斯·迪韦尔热是法国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步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积极倡导各个学科跨领域合作, 较早建立了一门“交叉学科”——政治社会学, 且尝试着以社会学互动理论为主干, 运用社会学独特的研究方法, 从社会的宏观层面去观察、比较、分析各种政治现象, 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及社会制度等方面来分析国家权力的性质及运作规律, 并对当时流行的并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作比较和评断。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的发表, 是政治社会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通过对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思想的探究, 我们

可以从研究对象、关注的主题、建构的核心和独特视域等几个方面构建其思想的基本框架, 使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 为后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提供理论指导, 对当前政治社会学学科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政治社会学一般研究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政治权力的产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迪韦尔热在建构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学思想时, 首先对当时流行的政治社会学两大流派“国家学”派和“权力学”

收稿日期: 2017 - 11 - 04

作者简介: 王思琴 (1994—), 女, 湖北襄阳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

派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具有思想史的脉络。

首先,“国家学”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与“国家至上”的价值理念息息相关,这种理论模式强调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共同体,仅限于研究整体社会,即民族国家或政府国家这一类型。从黑格尔所推崇的“国家至上主义”,到韦伯所研究的“超阶级的国家理念”都显示出西方“国家学”派理论的特殊地位^[1]。之所以出现政治社会学即国家学这一观点,主要是受到发轫于20世纪初的法学家们的影响,比如德国的乔治·杰林内克和法国的马塞尔·普雷诺,他们认为“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是同义词,国家作为一种完整的社团,对其他社团并无依赖性,而且统治其他一切社团,因此,国家就是“君主”,国家的统治者也就拥有一种特殊的“统治权”,国家也因此被看作是一种强大的、自由的、有着绝对权力的实体。而马克思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则与西方将政治社会学偏向国家学方向的解释不同,因为马克思关于国家这个研究对象的全部分析都强调其与整个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强调国家的“上层建筑”特性,对国家的定义同“君权”论没有联系。迪韦尔热认为把政治社会学说成国家学,就是把它纳入以社会性质为依据的社会科学之中,而政治社会学同原始社团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却大不相同。此外还会导致它脱离其他类型的社会,比如在民族社会的分析问题上,就意味着把民族社会和国家看作不同于其他人类团体或集体的另一种类别。

“权力学”派所认为的权力不仅仅包含国家意义上的权威观念,它还包含着所有的社会领域和民间团体的权力关系,以及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行使。它突破了传统政治学局限于研究国家本身的狭隘范围,把政治学研究扩大到社会 and 所有团体中的权力。但迪韦尔热通过分析发现,若把政治社会学完全看作是权力学,会因权力的概念本身而带来一些难题,比如说很难对政治社会学中权力的概念进行定义,并与其他学科中权力的概念做出区分;很难把一种被看作是影响或力量,以及本团体成员承认这种影响的合法“权力”与未被承认为权力的实际影响区别开来。因此,他认为还需进一步扩大分析,探讨同权力行使有关的各种影响的形式,通过与其他社团的权力形式进行比较,科学地探究国家权力的性质。政治社会学的宗旨

就是要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之中,因为“政治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领域”,世界上没有一种事物是完全独立的政治现象^[2]。

在何为政治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迪韦尔热认为把政治社会学单纯看作是“国家学”或“权力学”是不合理的,应根据所适用的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文化来明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若完全以国家为研究对象,政治社会学将会与传统政治学相混淆;若完全以社会领域内的权力为研究对象,政治社会学又会有类似于社会学的嫌疑。由此可见,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会采纳不同的划分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把政治社会学的定义偏向于国家学,有利于政治社会学的科学发展;而在西方,这种定义则可能使政治社会学的发展陷于瘫痪,它模糊了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学科界限,人为割断了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使其在研究对象上趋于重叠,不利于政治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创新,最好的方法是采纳一种把国家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而不给它以特殊地位的定义^{[3][1]}。

因此,迪韦尔热在做出充分比较后认为,应该把“国家学”和“权力学”结合起来,让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在社会制度中运行,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作用、社会阶级都当作制度来考察,把社会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应用于政治现象的研究之中,在互动作用体系,即所谓的社会制度的揭示中,来触及政治社会学的根本问题,比如互动作用体系中存在的权力、等级制度、政党问题等。在对互动作用体系的论述中,迪韦尔热更加强调体系的概念。互动作用是在体系的已有范围内产生的,社会整体是互动体系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是互动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政治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运作,是以社会为载体的,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政治国家的发展就失去了坚定的基石。因此,可将迪韦尔热所论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对象概括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即在政党体系与等级制度条件下社会对国家的环境影响,以及两者在相对独立状态下,国家对社会的政治影响,两者之间相互渗透和作用。

二、政治社会学关注的主题: 政治社会化中的文化适应

人的主体性是任一社会科学都不可忽视的,因

此，在政治社会学领域，迪韦尔热在探究其基本内容时特别关注了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社会化过程与文化适应问题。政治社会化即社会政治文化的代际传递，基于学习理论、态度理论以及政治系统理论等前提下，社会成员通过家庭、学校、大众媒介等，开始进行术语和技能学习，初步形成认知情感的社会化，最后形成个人和总体的社会化。由此可见，政治社会化是获得政治取向的过程和方式，也就是说，是学习与政治目标相一致的心理取向的过程和方式。对于政治社会化的大规模和有系统的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学者们大体上能达成的一致看法是：认为价值、情感、认识都是政治取向或心理取向的内容^[4]。直到1973年迪韦尔热在其《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中，通过对赫伯特·海曼、戴维·伊斯顿、布迪厄和帕斯隆等人关于政治社会化思想的批判，提出实际上政治社会化与文化适应和合法性有关，政治文化适应的目的就是维护现有的合法制度。每一种政治文化类型都与同一种政治结构有关，乡土文化适合一种极为分散的传统结构；奴役文化适合一种专制和集中的结构；参与文化适合一种民主结构。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适应性是保证制度稳定所必需的，但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政治文化都是以上三种成分的混合物，其比重的变化视一个国家的居民成分而定^{[3]72}。但一般情况下，在政治社会化发展中，国家为了让政治文化与整体社会文化相适应，为了让本集体的成员都接受和消化标准、方法、价值和角色，必须要经过一个文化适应过程。它分为两个阶段，初始阶段称作儿童社会化阶段，延续阶段称作不断的文化适应阶段。当一个人走向社会时，他已经完成了儿童社会化阶段，将面临着一个成人社会化的问题，特别是政治文化的适应问题。在人一生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政治文化适应，一类是一元文化适应，一类是多元文化适应。多元文化适应与一元文化适应相比较，更强调文化可以容忍的偏离及改变其标准的程度，而一元文化适应在于集体的成员采用何种手段来吸收这些标准和价值。简单来说，如果一种文化适应过程集中于现有政权，那就是一元文化适应；若一种文化适应过程由分散的、不同的人控制的，那么就属于多元文化适应。

迪韦尔热通过对比两大对立制度——一党制度

和多党制度，集中研究社会成员继续社会化阶段中的政治方面，而这两种制度仅针对发达的工业社会而言。迪韦尔热认为：目前在实行法西斯的一党制度或保守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体现的就是一元文化适应^{[3]84}。这种一元文化适应与所在的国家一元性文化相吻合，这些国家政权通过培训技术手段和群众交流手段等来垄断文化适应过程，通过发展有组织的集团和利用各种传播媒介把公民禁锢在整体社会文化的各种联系之下，把公民的文化适应过程掌握在政府或附属机构手中。此外文化适应的一元性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第一，把保守主义制度同法西斯制度作比较可以发现，这些组织机构的效率还取决于它们的传播形态，例如单一政党国家和多元政党国家，以及宗教的控制力量都对文化适应的传播方式有影响。第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很难把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完全割裂开来，比如旅游者可以通过与当地人接触，发现其存在的差异；外国的电视节目、网络资讯几乎可以覆盖一元性国家。第三，一元文化适应中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某种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受益范围比较有限，大概只存在于“知识分子”这一内部小圈子，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外，这就造成了两种文化并存的局面，一种是知识界精英人物层面的多元化文化，另一种是民众层面的单一文化。西方国家是多元文化适应的典型，群众交流手段不是在公共权力手中，而是分散在各大工会、政党、政府机构、资本主义企业和独立公共服务机构等手中，其在文化适应的表现过程中呈现的潜在意识形态、传播的信息手段也具有多样性，比如在美国，民众共同同意的概念除了政治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之外，也体现在对民族的崇拜、对宗教的态度等看法上，他们有反对现有权威的自由，但也必须遵循文化习惯。而信息手段的多元化只有切实适应不同的文化而不是适应同一种文化不同的表面现象时，才能导致文化适应的多元化，但这种文化如果不包含大家所公认的一整套标准和价值，就不成其为真正的文化，那么它的多元性也是有限的。西方今日的自由社会，看似文化多元，但人民群众实际上却被禁锢在一种潜在的亚文化之中，比如报刊、广播、电视的真正目标已经不是向人们提供消息或转播官方的宣传了，它的最终目的只是利用广告来最大限度的出售商品，以钱为衡量标准已违背了这些媒介的初衷，为了避免一切激起反

感、争论或与主文化相冲突的事情,使信息越来越缺乏真实性,它在事实上损害了表面的文化,因此,信奉这种表面文化的人越来越少,尽管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是自由的,但是民众的文化却是单一的,几乎不存在真正的多元性文化,只有在“精英”的圈子里,文化才表现出多元化,并且不同的阶层存在不同的差别,但这同样是西方文化价值和标准的体现。

三、政治社会学建构的核心: 社会制度中的权力

权力是政治社会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众多的政治社会学流派往往都会深入地探讨这一范畴。迪韦尔热在建构自己的政治社会学思想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及其在社会制度中的重要性,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在阐述权力的概念时,他受到罗伯特·达尔的定义的启发,提出了自己关于权力的概念,他把其他研究者称之为的“权威”仍称作“权力”,认为权力就是根据行使这种权力的社会标准、信仰和价值得以确定的合法的影响或影响力形式。在权力的众多类型中,若要区分政治权力与其他权力,关键是要避免“政治权力”这个术语带来的混乱,由于使用者的理解差异,这个术语的含义会千差万别。在定义“政治权力”时,有两个大的互相对立的概念范畴,一种观点是根据集体的类型而决定权力是否算政治权力,它认为权力的政治性质要看实行这种权力的是哪一种类型的集体,如果这种权力是在整体社会中行使的,它就是政治权力;在个别集团中行使的各种权力则不是,比如说部落酋长、古代城邦的执政官、封建领土和现代国家中的执政者都拥有政治权力,而工会、联合会、企业、管理机构的领导人所拥有的权力则不属于政治权力,在这个范畴中,有些人的定义甚至更为极端,在他们看来,只有民族国家才具有政治权力^{[3]105}。韦尔热认为这种观点和把政治社会学定义为国家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割裂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过于狭隘。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整体社会或国家是不依附于任何其他集体的最高集体,就意味着这个集体的权威是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权威的最高权威,迪韦尔热认为这种概念正如作为其基础的主权概念一样,与其说是社会学概念,不如说是法学或哲学概念,它模糊了学科之间的界限。迪

韦尔热在分析这两种概念范畴后,认为可以对第一种观点做一个修改,建议把政治权力看作是在一切集体中行使的完整权力,而不是在整体社会中行使的权力,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组织、维持和发展这个集体并保护它不受其他集体侵犯的权力。

在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中,他认为权威与掌握权力的人有关,这种概念提法揭示了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即在一个集体中一般都有一些符合一定章法的角色系统,它能够使处于这种地位的人有权让低于其地位的人或者同等地位的人服从自己,而且后者也认为这样做是合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权威都是制度性的^{[3]108}。他将权威的制度性贯彻到了自己的政党理论中,提出了后来研究者所称的著名的“迪韦尔热法则”,这一法则认为,相对多数代表制有助于两党制的形成,比例代表制更有助于多党制的形成,而两轮投票制则易形成多党联盟。对于选举因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结果,迪韦尔热用“机械效应”和“心理效应”来解释,选举结构的不同会造成政党的得票率和议席率上的偏差,比如在相对多数制下,众多小党为了求生存而联盟共同对抗某一优势政党,容易形成因势力划分的政治联盟,这就是制度所引起的“机械效应”;针对选民心理而言,如果有三个政党在统一选区竞选,在小党希望渺茫的情况下,若把选票投给小党,不仅无法改变选情,还是一种权力浪费,因此,为了使选票发挥作用,选民往往将选票投给竞争力较强的两大党的其中一方,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效应”^[5]。因此,迪韦尔热认识到,无论一种权威具有多么深刻的制度性,注重掌权者的个人威望以及群众的支持仍是该集体成员的首要任务。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选举已经成为任命最高掌权者的最流行的方式,它以民主、和平等为基础,使每个成员都有了行使权力的可能,最后的掌权者都是具有合法的权力,受大部分民众支持和爱戴的人,因此,若一位领袖被大多数集体成员接受和拥护,那么他的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无论是单一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国家,平等权力的分配和行使,有助于提高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其次,权力的分配、运行和监督还为国家政治制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让权力在社会制度中运行,让拥有权力的双方相互制衡,才能够形成和谐的政治环境,有利于良性政治生态的形成。

四、政治社会学独特的视域： 政党的社会基础及合法性

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壮大，离不开现实政治生活中相应组织的主体支撑和力量支持，在政治社会学中政党是其关键性的支持，它是早期政治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迪韦尔热在《政党》一书中，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个人的社会作用、社会阶级都当作制度来考察，把政党的结构特征作为政党类型学的前提，提出了其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命题，即如何从政党的社会基础来看待政党的起源与结构以及政党的合法性问题。由此可见，迪韦尔热把政党纳入政治社会学的主要论域正是其政治社会学思想中较为独特的一面。

迪韦尔热认为，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政党的社会基础包含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他通过分析各阶级以及党派斗争的状况，从两个方面分析论证了政党的源起：一是选举及议会源起，即内生党。这种议会源起的方式所形成的政党是一种各集团间相互联系的媒介，是内部组织协调的产物，是一种必然趋势。二是外力源起，即外生党。它是指在选举委员会和议会集团之外诞生的政党，如工会、教会、思潮团体、工商业团体等外力组织催生的政党，最具代表性的则有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和苏联共产党，他们都是由地下组织发展起来的政党^[6]。迪韦尔热认为这种由外力源起的政党都明显具有权力集中的特征，而且都不可避免的带来一种事实上摆脱议会及选举活动的倾向，但无论是“内生党”，还是“外生党”，这种源起的方式实际上都拥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组织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政治参与都需要政党的协调。在分析形成间接党结构的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时，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领域提出了一个社会学模式：若工会或合作社比社会主义政党出现的时间较早，后者自然倾向是在前者的结构上组织起来，并以间接参加作为基础；相反，如果政党的产生早于工会，它采取直接参加的方式^[6]。这个社会学模式反映了初始政党形成时的组织架构及参与方式，揭示了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国民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多数党

组织可能更偏向于形成间接党组织（通过填写入党表格并按时缴纳党费，同时或多或少定期出席所属分部的会议的政党），而不是直接党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参考意义，对于整个政党的运行和协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迪韦尔热分析政党的社会基础，实际上也是在探讨政党的合法性问题。政党的合法性是指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和服从，它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当性^[7]。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民众认同感，在西方民主政体下，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对于执政党掌握国家权力至关重要，因此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般情况下会提供一套与时俱进的，具有强大包容性的，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在政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以此来塑造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和情感，持续增强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感，当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为大多数民众认可的时候，政党就具有了较高的合法性。在迪韦尔热看来，“理解现代政党的不同之处与认识现代政党的相对有利因素的另一种方法是，按照其成员结构进行分类”，因此根据这条标准，他把政党分为两种类型：干部党和群众党。但关于政党类型的划分，迪韦尔热只是描述了某种趋势，而不是明确的划分，群众党实际上是左翼党的自然类型，而且这种类型实际上是欧洲普选制的推行带来的结果^[8]。干部党只是为了选举大战做准备，争取选举人的信赖，而不是公众的信赖，并认为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处于普遍衰落的干部党在西方国家已经很大程度上被群众党所代替；而群众党是现代社会选举权范围扩大的一个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以支部和基层组织为基础的欧洲社会党以及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征^[8]，它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党员规模，并且在全国各地广泛进行宣传活动以吸收新党员，力求在民众当中获得广泛而又热情的支持，通过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以赢得选举的胜利，因此这种群众党就具有了高度的民众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其在发展过程中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第二，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在科学合理的政党制度实施的前提下，政党领导人获得国家权力之后，权力的运作也必须受到宪法和相关部门的严格

约束,最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这种监督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政党内部高层人员的权力,能够增加民众对政党的信心,进而产生信任感和拥护的心理,同样可以使政党权力在更加法治的环境下运行,只有在权力得到制约监督的条件下政党才能得到发展的空间,在不同的政治主体互相分立,彼此制衡的环境下,才有利于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才能够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整个国家发展的强大力量。总之,只有民众认同感和权力的正当性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能够构成权力的真正合法性。

在政治社会学领域,迪韦尔热较早地确立了这一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深入论述了权力、权威、共同体以及制度等重要概念,探讨了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中的文化适应过程及问题,特别在论证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合法性问题时提出了当代选举制度研究中的一条著名法则——“迪韦尔热法则”。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奥罗姆在《政治社会学导论》中提到,可以从迪韦尔热的《政党》一书中找到关于现代政党各种最透彻的不同论述,认为其关于政党的分类方法虽然普遍受到指责,但仍有极大的启发性和实用性,例如迪韦尔热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以支部或基层组织为基础的群众党,如欧洲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干部产生于议会或立法机构之外,这也许说明了群众党比较关心民众参政,以及经常设法把普通成员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原因^[9]。由此可见,迪韦尔热关于政党的思想在政治社会学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其《政党》一书以其创新性的角度和开阔的视野,被公认为政党理论经典著作之一,该著作关于政党理论的基本观点,在西方政治研究领域独树一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当代政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五、结语

当前我国在政治社会学领域,在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的深度和持续性等方面尚处于未形成共识的不成熟阶段,需要通过借鉴西方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资源并结合中国实际,来不断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发展^[10]。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研究为我国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建设提供了框架性的指导,满足了我国日益增长的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社会市场需求,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繁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国家与社会互动而言,为我国当前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解释,西方传统的政治观点无论是“强国家”与“弱社会”关系或者“强社会”与“弱国家”关系都是对我国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片面理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社会得到充分的政治滋养,同时我国政治组织、政治体制也逐渐获得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逐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相赋权。在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庇护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将具有更广阔的空间。相应地,政治社会化过程也将进一步的深化,在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更加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增强社会成员的政治以及文化认同感,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实基础,为我国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力保障。

【参考文献】

- [1] 李金辉,崔成子. 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及其当代价值[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1(6): 110-114.
- [2] 刘京希,姜强. 学科细分与学科扩展的统一[J]. 政法论丛, 2006, 4(8): 5-10.
- [3] DUVERGER, MAURICE, 杨祖功, 等. 政治社会学: 政治学要素[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4] 朱国云. 政治社会学概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163.
- [5] 周杰. 新选举制度对日本政党体制的影响[J]. 日本学刊, 2009(4): 5-15.
- [6] 杨天雄. 浅析莫里斯·迪韦尔热政党理论的基本思想[J]. 社科纵横, 2014(12): 45-47.
- [7] 何源章. 政党执政合法性涵义辨析[J]. 广西社会科学, 2005(6): 12-14.
- [8] 向文华. 西方群众党类型理论述评[J]. 教学与研究, 2014(3): 96-103.
- [9] 安东尼·奥罗姆. 政治社会学导论[M]. 张华青, 何俊志, 孙嘉明,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199.
- [10] 岳天明. 中国政治社会学: 学科传统、确立和发展困局[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1): 106-112.